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 · 文学语言研究系列

The Selected Works of CASS ·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

ETYMOLOGICAL RESEARCH OF MANCHU TUNGUSIC LANGUAGE

朝 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舊約古賈隱微研究

THE STUDY OF THE HIDDEN MEANING OF THE OLD TESTAMENT



新文豐出版公司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

ETYMOLOGICAL RESEARCH OF MANCHU TUNGUSIC LANGUAGE

朝 克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 / 朝克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 - 7 - 5161 - 3808 - 3

I. ①满… II. ①朝… III. ①通古斯满语族—词源学—研究
IV. ①H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10209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策划编辑 郭沂纹
责任编辑 郭沂纹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刘俊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1.75
插 页 2
字 数 575 千字
定 价 82.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出版说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全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课题成果文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出版的系列学术丛书。组织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是我院进一步加强课题成果管理和学术成果出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重要举措。

建院以来，我院广大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智力支持和各学科基础建设方面，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每年完成的专著类成果就有三四百种之多。从现在起，我们经过一定的鉴定、结项、评审程序，逐年从中选出一批通过各类别课题研究工作而完成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代表性的著作，编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集中出版。我们希望这能够从一个侧面展示我院整体科研状况和学术成就，同时为优秀学术成果的面世创造更好的条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分设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学语言研究、历史考古研究、哲学宗教研究、经济研究、法学社会学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七个系列，选收范围包括专著、研究报告集、学术资料、古籍整理、译著、工具书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

2006年11月

前　　言

满通古斯诸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其中包括现在的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五种民族语，以及历史上的女真语。像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等均属于跨境民族语言，这些语言的使用者除了我国之外，在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也有不少。而且，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同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以及同朝鲜语、日本语、日本的阿依努语、北欧的萨米语、北美的印第安语等，均有十分复杂而多层面的历史渊源关系或共有关系。正因为如此，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工作，一直引起国内外相关学科的极大关注与兴趣。就如人们的共识，语言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所以，通过对于不同民族语言的科学的研究，可以不断探索、考证、阐释、论述他们的早期历史、社会、文化、文明及其发展轨迹。对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历史记载或文献资料又很少的民族来讲，对于他们母语口语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和更有价值。从这个角度讲，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同样有其特定而深远的学术意义。尤其是对于我国女真语、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等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词源问题至今还未展开全面系统的比较研究，至今还未见到在此学术领域的任何科研成果的发表或出版的前提下，加上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已经全范围地进入濒危或严重濒危的特殊历史时期，该项研究显示出极其重要的学术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根据我们掌握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研究资料，完全可以了解到女真语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这或许与女真语言文字历史文献资料十分有限相关；对于满语的研究，从清代开始一直到今天几乎没有间断过，陆陆续续出版发行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清代有关满语满文的研究几乎达到最为辉煌的时期；对于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的研究，早期民族语言、文化、历史方面的有关成果与资料中有所涉

及，但展开专题性全面深入研究的成果，可能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也出版过一些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田野调查、搜集整理、局部分析研究的论著。然而，并不系统和深入。那么，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之间作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比较研究的论著更是不多。不过，我们的资料表明，对于其中某一语言的方言土语进行比较研究的论著确实也有一些。另外，还有对该语族某两种语言词汇进行局部比较的成果。其中，也包括本人的一系列公开发表与出版的论著。比如说，于 1995 年及 1999 年间，先后由日本北海道大学、日本东北大学用日文出版的《满通古斯诸语基础词汇（1000 条）》、《中国的满通古斯诸民族及其语言》两本书。在这里，还应该提到的是，本人对我国满通古斯语族的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从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方言学、比较语言学理论视角展开学术讨论的科研工作，以论文形式先后在《民族语文》、《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内蒙古社会科学》、《内蒙古大学学报》、《内蒙古师大学报》、《满语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等国内学术期刊，以及日本的《语言研究》、《语言接触研究》、《语言与教学》、《语言论坛》，韩国的《阿尔泰学报》等国外学术刊物上，用汉文、蒙文、日文、英文公开发表，论文数量多达 140 余篇。同时，由商务印书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科文献出版社、方志出版社、民族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内蒙古文化出版社、日本大学书林、日本东京外大、日本东北大学、北海道大学出版部等出版社和出版部门用汉文、蒙文、日文、英文先后出版了《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等独著 12 本，以及《索伦鄂温克语》等合著 7 本。

总之，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内女真语研究可能是属于起步最早的学术领域。然而，留给后人的学术成果却寥寥无几，甚至可以说除了极其有限的文字资料之外，几乎找不到一本完整、系统、全面研究的语言文字资料。到了 20 世纪以后，才有相关研究论著问世。再说，满族语言文字的研究，虽然在清代取得了世人瞩目的辉煌业绩，也留下浩如烟海的语言文字学术资料及其历史书籍。但后来对于满语口语或使用现状及其语言演变的研究，却处于发展十分缓慢或几乎停滞不前的历史阶段。从 20 世纪才有了一些起色，并在满语书面语语法研究、满语口语语音、词汇、语法、方言等方面的研究进展比较顺利，取得了应有的学术成绩。但对于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的研究工作，似乎是从 19 世纪末或 20 世纪初才先后起步。而且，真正有价值的学术研究成果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才被先后公开发表或出版。

不过，属于比较研究类的成果，基本上是在某两种语言之间，或某种语言的方言土语之间，或者是在某种语言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作比较的产物。涉及满通古斯语族现有五种语言作比较研究的专著及词汇集，只有笔者的《满通古斯诸语比较研究》（1995）、《满通古斯诸语基本词汇比较（1000 条）》（1995）等。不过，在前人的研究中，从词源学的角度，对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词源展开学术探讨的成果至今还未见到。

作为项目人，在这里有必要提出的是，本人从 1981 年 1 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语言室从事民族语言科研工作的 30 余年时间里，一直潜心研究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其间，主持并参加有关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文字，或涉及满通古斯诸语某一特定研究范畴的国家级（包括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重大课题 12 项、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 4 项、文化部课题 2 项、教育部课题 2 项、中央民族大学 985 课题 1 项、国际合作课题 14 项以及地方的有关课题等。毫无疑问，这些国内外科研项目的具体实施和完成，为本课题按部就班地顺利进行与圆满完成，打下了坚实的学术理论基础，具备了浓厚的学术研究前提条件，进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学术导向作用。另外，在这 30 余年的科研工作实践中，本人除了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之外，每年都拿出一定时间到满通古斯诸民族生活的偏远农村、牧区、山林、边疆地区开展语言田野调查，搜集整理并汇编了《三家子满语口语调查资料》（1987/1995/2004/2011）、《黑龙江满语口语调查资料》（1988—2010）、《街津口赫哲语调查资料》（1986/1998/2007）、《呼玛鄂伦春语资料》（1984/1998）、《甘奎鄂伦春语调查资料》（1987）、《鄂温克语调查资料》（1—5 册，1982—2006）、《锡伯语口语调查资料》（1—2 册，1995/2003/2011）等语音、词汇、语法方面的数量可观而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语言资料及相关话语资料。从而为本课题积累了丰厚的田野调查资料和语言词汇，打下较理想的科研工作基础。再说，本人公开出版和发表的一些论著先后荣获国内外科研成果奖。同时，对于本人的科研成果，国内外多家媒体做过较全面报道，不少成果被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图书资料馆、数据库、信息资料网所收藏。

本人尽管在国内外相关学术刊物上，用汉文、蒙文、英文、日文先后发表过不少有关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语音、词汇、语法、方言、比较研究，以及同阿尔泰语系语言作比较的学术论文，也出版过不少研究著作。然而，对于我国境内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词源关系，从词源学的学术理论视角展开学术研究的科研工作这还是第一次。就像在前面所

理、研究这些濒危或严重濒危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再过几年立项研究或启动该项课题就会显得更加有困难。因为现在懂这些民族语的人均已进入高龄化阶段。而且，伴随懂母语的这些高龄老人们的去世，像满语口语、赫哲语、鄂伦春语等已进入严重濒危状态的语言将永远离我们而去。

我深深地懂得，作为多年来潜心研究我国北方诸民族语言文字，特别是专心研究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文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工作者，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极高点，带着高度而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责无旁贷地自觉承担这一《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的学术历史使命和艰辛的科研工作任务。或许仅仅是这一份责任和使命，本人在过去的岁月里，每年拿出一定时间到满通古斯诸民族生活的区域，对于他们现存的或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开展田野调研工作，不断战胜和克服科研工作或田野调查实践中遇到的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问题，常常和发音合作人或作为调研对象的农民、牧民、猎民同住、同生活、同劳动，尽最大的努力去搜集富有代表性、民族性、独特文化性和历史性的词汇资料，从而较完整、全面、系统、精确、细致地归类、整理出他们的词汇结构体系。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执著、敬业、合格的民族语言科研工作者，始终没有被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所吓倒，始终没有放弃实施并完成该项课题研究的计划。

经过 20 余年的艰辛曲折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搜集整理工作，自己认为已经具备了能够实施并完成该项课题的基本条件，并通过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提交了实施《满通古斯诸语词源研究》课题的申报书。感到很欣慰的是，该项课题很快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高层评委，以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高层领导的审批通过。项目经费拨下来之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该项课题研究工作。

该项课题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首先，进一步全面系统归纳、整理、分类过去搜集的词汇资料。其次，把对严重濒危的满语口语、赫哲语、鄂伦春语及已进入濒危状态的锡伯语与鄂温克语基本词汇的大量补充调查，以及词汇演变现象、演变规律的调研工作作为重中之重。而且，根据这些语言词汇的结构性特点，设置了有所不同而有所侧重的词汇调查表格。包括对不同地区、不同方言土语、不同语言针对性设定的表格和调研内容。例如，对于偏远农村农区、草原牧区、山林猎区、江河渔业区设定的调查表格及其内容，分别侧重于农村农业农民生产生活、草原牧区牧民生产生活、山林猎区猎民生产生活、江河渔业渔民生产生活密

切相关的基础词汇条目。众所周知，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词汇系统，均不同程度地存在各自具有的结构性特征。比如说，满语中东北温寒带农业用语及宫廷用语十分发达，锡伯语里西部农业用语及其自然环境与社会关系方面的词汇比较突出，鄂温克语内与寒温带草原牧区牧民生活及其寒温带草原动植物用语特别多，鄂伦春语中关于寒温带山林狩猎生产生活及其寒温带山林动植物词语较丰富，赫哲语内同温寒带及寒温带江河渔业及与江河湖泊自然环境相关的用语占优势等。在这种现实面前，必须依据不同民族的不同生产生活内容及语汇特征来设定词汇调查表格与实地调研计划。否则，到了地方，对于表格和事先设定的调研计划再作调整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为此，务必事先做好充分、认真、细致的准备工作。另外，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科学地选定调查点及调研对象，合理分配和布局调查的面和点，确保第一手语言调查资料达到客观性、代表性、精确性、全面性、系统性、历史性和民族性，确保不漏掉十分重要而应该涵括的词汇资料。

如前所述，本人在过去的岁月里，虽然做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和准备工作，但在具体实施本课题计划时，把重点难点还是放在已进入严重濒危状态的满语口语、赫哲语、鄂伦春语口语资料及基础词汇的调查研究方面。在项目启动后，到实地进行词汇补充调查时更加清楚地感受到，对于严重濒危语言的同源词展开调研工作的难度。毋庸置疑，这跟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进入濒危或严重濒危状态有关。起初本人调研时，或者说该项目正式启动之前进行词汇调查时，在此方面的感受并不十分突出或明显。因为本人基本上能够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进行交流。加上前期科研工作实践中积累的词汇资料，现已掌握的现代口语词汇数量，熟练把握的构词系统，甚至是较全面了解的词汇音变规律等，都对该项目启动之前的田野调查与词汇搜集整理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不过，从某种角度上讲，本人现已掌握的这些词，主要是属于现代口语里常用的或经常出现的基础词汇，更多的早期词汇或使用量较少的词汇就很难包括其中，进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启动后的进展。并且，越到后期同源词搜集整理工作进行得越加艰难和缓慢，所遇到的问题点越来越多。特别是，一些相当重要而有一定代表性的同源词，只在个别语言或一两种语言里被保存，而在其他语言中却不再使用了，或者干脆由借词取而代之。有的实例是，由于各自具有的自然条件、社会环境、生产方式而表现出有所不同的词源关系。还有的实例是，由于各自进入了不同发展阶段，走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并伴随自然与社会各方面的环境与条件

产生不同变化，导致一些同源词出现不同程度的音变或演变，使人很难把握其早期语音结构形式及其演变规律。所有这些，都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课题，在后期同源词调查、搜集、整理、研究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反复多次深入到满通古斯诸民族母语使用区，展开实地调研和同源词搜集整理工作。常常是跋山涉水、登山越岭、穿越原野，经过几天的艰难行程才能找到较为理想的发音合作人，得到苦心寻找的那些词语或早期同源词。

总而言之，经过 20 余年的积累，加上这几年的艰辛努力，使自己终于按照原定计划完成了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学研究之课题工作。在具体实施研究计划时，本想将女真语从中拿出来，不同满通古斯语族的其他几种语言相提并论。因为女真语词汇资料非常有限，无法满足从词源学的角度，同其他语言词汇进行全面、系统、深度、整体的比较研究的数量要求和条件。但是，在充分考虑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的完整性与全面性，考虑到女真语仅有的词汇中保存的有分量的词汇演变现象与实证资料，以及女真语有限的词汇资料中出现的词源研究方面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把女真语现有的那些词汇放入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汇序列中，作为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的一个内容和组成部分。另外，对于该语族语言的同源词展开具体分析研究时，把原有语音结构形式保存较好的实例放在最前头，紧接着也是依据原有语音成分的保存程度的高低、好坏、多少来排列或讨论其他语言的同源词。而且，对于语音变化现象非常复杂的那些同源词，所作的分析研究及其阐述内容要多一些。与此相反，对于没有什么语音变化，或者语音变化现象比较简单同源词，展开的讨论或阐述的内容也比较少。特别是，对于那些在语音形式和语义结构方面均没有任何变化，用原有形式和内容在不同语言里原原本本地使用的同源词，没有做任何的分析和论述。比如说，由于他们将“河”均叫 bira，没有出现任何的语音及语义方面的区别性特征，没有必要做任何分析和论述。相比之下，在该语族的几种语言内，将原来的语音形式保存完整的同源词不太多，绝大多数同源词均存在或多或少的音变现象。再说，多数音变实例有其严格的内部规律，有的音变现象却显得极其复杂而特殊。尤其是那些常用的同源词，在不同语言中表现出的音变现象，多数属于比较复杂且具一定规律。那些不常用或者说很少用的同源词，在不同语言里表现出的音变现象，却显得不太复杂或十分简单明了或相当完整地保存了原来的语音形式。

我们分析和论述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同源词时，首先选择在满语、锡

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五种语言里均被使用，而且没有多大语音变化现象的实例。比如说，“鼠洞”的早期语音结构应该是 *dʒurun，然而在不同语言里却发音成 dʒorun（鄂伦春语）、dʒorun（鄂温克语）、dʒor（赫哲语）、dʐurun（满语）、dʐurən（锡伯语）等。很自然，这其中就出现 dʒ > dʐ、u > o > ə、n > ɳ 三种形式的音变现象。其次，选择在这五种语言中都使用，语音变化现象较大且有规律可循的实例。比如说，“虎”的早期语音结构应为 *tasugan，后来却在不同语言里产生 tasuga（赫哲语）、tasug（鄂温克语）、tasaki（鄂伦春语）、tasha（女真语与满语）、tash（锡伯语）等有所不同的说法。但是，根据该同源名词的音变关系及特征可以归纳出 *tasugan > tasuga > tasug > tasaki > tasha 式音变规律。再就是，选择那些在不同语言里虽然产生了各自不同的较大幅度的音变，却可以充分利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复杂多变的音变原理，能够科学解释和论述其同源关系的实例。比如说，同源名词“老鹰”的早期语音结构是 *gijahun，可在不同语言里发作 gijahun（满语）、giahun（女真语）、geehun（锡伯语）、gihiŋ（鄂温克语）、heehən（赫哲语）、jeekin（鄂伦春语）等。能够看出，该同源名词在不同语言里，从元音和辅音结构形式方面均产生较大幅度的音变。尽管如此，我们充分利用该语族语言复杂多变的音变原理，将其音变现象归类为 g > h > j、i ja > ia > ee > i、h > k、u > o > ə > i、n > ɳ 五种形式，从而科学阐明它们之间存在的同源关系。同时，将极其有限的女真语同源词也作为重要旁证，一并分析相关词条的词源问题。另外，还考虑到不同地域和地理环境、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产生活条件等因素，将某些同源词从不同语支语言的角度分别展开了不同层面和不同视角的分析讨论。比如说，有关“山”的叫法上，满通古斯语族两个语支语言分别有两种不同称谓，一是女真语、满语、锡伯语等满语支语言里叫 alin，二是在赫哲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等通古斯语支语言中说 urə > ɯrə > ɯr。类似实例，均被认定为两个语支语言的两种不同的同源词。与此相关，在他们的同源词里还有一部分超出语支语言界定，在女真语、满语、锡伯语、赫哲语内共同使用，而另一些实例只使用于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里。比如说，称呼“蛇”的时候，满语支语言的女真语、满语、锡伯语及通古斯语支语言的赫哲语都叫 məihə，可在通古斯语支语言的鄂伦春语和鄂温克语里却说 kulin > holeŋ。还比如，对于“燕隼”满语支语言的满语与锡伯语及通古斯语支语言的赫哲语叫 *jabsahu > jabsah > jab şahə，而通古斯语支语言的鄂温克语与鄂伦春语却说 uliŋʃi。

而且，属于此种类型的同源词还占一定比例。在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分析和讨论有关同源词时，将某一语言内出现的同一词义的不同说法都一一罗列了出来，目的就在于让人们对同源词有个客观实在而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这对于同源词研究，有着相当重要而积极的作用。比如说，*buhu* ~ *tobgia* ~ *timho* “膝盖”（锡伯语）、*garmakta* ~ *nalmagta* ~ *taʃʃig* “蚊子”（鄂温克语）、*tsunquru* ~ *uləŋgu* “肚脐”（满语）、*kotoŋko* ~ *moŋgo* “独木船”（鄂伦春语）、*titi* ~ *ətukə* “衣服”（赫哲语）等。甚至，涉及到某种语言，对某一事物的说法中出现的有所不同的语音结构特征。比如说，*mugə* > *məwə* > *mə* “水”（鄂温克语）、*boso* ~ *boʃigo* “山阴坡”（鄂伦春语）、*ʂok ʂohon* > *ʂok ʂon* “山尖峰”（满语）、*gurəgə* > *gurgə* “野兽”（锡伯语）、*kilahun* ~ *kilun* “鸥”（赫哲语）等。也就是说，我们将这些对于某一事物的不同说法，或在语音方面有所区别的同源词及其相关词语，均作为附属性词汇资料列入文中。这使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同源词分析与研究内涵变得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有意义和学术价值。

该项研究没有涉及那些语音变化现象极其复杂，难以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音变原理进行科学分析和归纳的同源词。比如说，他们将“鸽子”叫做 *kuwətʂih*（满语）、*gutʂkə*（锡伯语）、*tuuttege*（鄂温克语）、*tutuje*（鄂伦春语）、*bogədʒi*（赫哲语）等。从严格意义上的词源学角度来分析，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对于“鸽子”的不同叫法应源于一个词根，该词的核心音素间存在诸多深层次渊源关系。但仅仅依据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语音演变原理，去探讨该词的语音变化现象，有可能拿不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科学结论。我们认为，对于该词的词源讨论，还需要词义学、构词学、历史比较语言学以及史学、文化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综合理论知识。由此，暂时没有考虑类似音变现象复杂的同源词。其次，对于那些叫法上有所不同，或者说有三个或三个以上说法的例词也没有纳入该项目的研究范围。比如说，他们把“猫头鹰”叫做 *huʂə* ~ *molto*（满语）、*molto*（锡伯语）、*geehij*（鄂温克语）、*mərmətə*（鄂伦春语）、*huŋsin*（赫哲语）等。再说，像 *morin ḏəqəqətə* “马蜂”（鄂伦春语）、*unaadʒ nəhəŋ* “妹妹”（鄂温克语）、*tarhun niməŋgi* “脂肪”（满语）、*ashaŋ şıŋər* “蝙蝠”（鄂伦春语）、*imə hulha* “蜻蜓”（赫哲语）、*bigani şoŋə* “野菜”（锡伯语）之类的合成词均没有放入这次的词源研究。另外，满语支语言或通古斯语支语言的某一语支内有同源关系的词，而在另一个语支语言内却没有见到有同源关系词的情况下，同

样没有把它列入这次的分析。比如说，他们把“柴火”分别叫 dəidziku (满语)、ditšiku (锡伯语)、dʒasa (鄂温克语)、ilaŋka (鄂伦春语)、mo (赫哲语)，将“瓜子”称其为 duŋga usə (满语)、duŋa usə (锡伯语)、həril (鄂温克语及赫哲语)、kəril (鄂伦春语) 等。这两种说法里，满语支语言的 dəidziku > ditšiku 及通古斯语支语言的 həril > kəril 两个实例自然属于各自语支语言的同源词，然而通古斯语支语言的 dʒasa、ilaŋka、mo 及满语支语言的合成词 duŋga usə、duŋa usə 等都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同源词，也难以从词源学的理论视角对它们展开学术讨论。

据我们掌握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同源词资料，他们的语言里同源名词的数量占有绝对优势。同源名词里，与自然物及自然现象、动植物、亲属称谓及人体结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用具等相关的同源名词居多。其次，也有不少社会关系、行政部门、文化教育、时间方向等方面的同源名词。再说，他们的同源词中，也有一定数量的同源形容词、同源量词、同源代词、同源数词等。然而，相比之下，同源动词的数量也占很大比重。而且，其数量仅次于同源名词。同源动词内，还分有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及物动词的数量要比不及物动词多。除此之外，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同源词里，还有一小部分同源副词和同源虚词。不过，我们认为，该语族语言中实际存在的同源名词及同源动词的数量，远比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要多。在这里，只是分析和讨论了在过去的研究实践中搜集整理，以及项目启动以后搜集到的同源词。再说了，不少同源词，在各自语言的不同发展历程中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演变，有的几乎变得面目全非，有的已被其他语言的新词术语取而代之，也有的在不同语言里已被不同程度地丢失或被遗忘。不论怎么说，在该项研究中，尽量涵括了在满通古斯语族语言中被使用或被使用过的同源词。特别是，将口语里至今被使用的同源词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如前所述，本科研成果的具体实施和完成，对于我国濒危民族语言的抢救和保护，对于形态变化十分复杂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同源词的理论探讨，对于他们的语音演变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分析，对于它们词汇结构体系展开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对于保存和弘扬我国北方民族优秀而传统的文化遗产均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再说，我国民族语言词源研究成果相继公开发表的今天，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词源研究工作的完成，显示出它的特殊学术价值和意义。特别是，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整体走向严重濒危，词汇使用量日益减少、使用范围日益缩减的关键时期，该项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还应该提出的

是，该研究中所涉及的同源词语音结构、语音形式、语音接触、语音影响、语音演变等内容，以及从词源学角度展开的科学分析和讨论，对于我国北方诸民族语言的起源研究、语言历史发展研究、语言变迁研究、语言接触研究、语言关系研究、民族历史研究、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发展与进程研究，均有特定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特别是，对于阿尔泰语系语言历史比较研究，乃至对于日本语和朝鲜语以及东北亚诸民族语言的历史来源与发展演变研究等均会产生十分重要的学术影响和理论作用。同时，对于建立健全我国北方民族语言研究理论体系，强化其国际学术影响力，提升其国际学术地位等方面，也将会有重要学术意义。我们还通过该项科研工作，可以进一步论证阿尔泰语学理论，阐明包括日本语和朝鲜语在内的东北亚诸民族语言的历史渊源关系，进而从语言学理论视角也可以阐述我国北方民族语言同北极圈诸民族语言间存在的深层共有关系。

近些年，本人除了开展该项科研工作之外，还主持或参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方面的一系列国内外重大项目。其中，包括国家级、省部级以及地方的科研项目、交办委托项目、社科基金项目、专题研究项目、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以及同美国、加拿大、德国、芬兰、日本、韩国、蒙古国等国家的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展开的国际合作项目等。通过具体实施国内外一系列研究课题，对于现代满语口语、锡伯语口语、鄂温克语口语、鄂伦春语口语、赫哲语口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结构、方言土语、语言使用、语言接触和演变现象、语言濒危状况研究等均有一个较全面、系统、完整而客观实在的认识和把握。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新的学术问题和研究课题。比如说，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变迁研究、形态语音论研究、名词形态论研究、动词形态论研究、虚词形态论研究、句子结构体系及其词组结构研究、濒危语言学研究、语言接触学研究、方言土语研究等方面，虽然也开展了一些科学探讨，做出了一些学术成绩，但需要再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还有很多。我会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更加尽心敬业，不断拼搏和努力奋斗，一步步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科研计划与工作任务，并为我国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研究事业不断作出学术贡献。

凡例

一 该文中使用的满通古斯语族语言语音系统

(1) 元音系统

a、ə、i、e、o、θ、æ、ʊ、u、ʌ、y

(2) 辅音系统

b、p、m、f、v、w、d、t、n、ɳ、l、r、s、dʒ、ʃ、f、tʂ、dʐ、ʂ、g、k、h、ɳ、j

二 该文中使用的有关符号及其说明

~ 表示“或”

↔ 表示双面等同

⇒ 表示例词及其所属语言

—— 同源词早期结构与不同语言实例的分界线

- 词根或词干与词缀的分界线

* 假定的同源词早期语音结构

> 发展变化的顺时针方向

< 发展变化的逆时针方向

+ 附加词缀

三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及其分类

- (1) 满通古斯语族语言包括女真语、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
- (2) 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语言包括女真语、满语、锡伯语；
- (3) 满通古斯语族通古斯语支语言包括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